

张璋 职承让 张骅 张博宁 编纂

歷代词話

续编

上

江泽民
题



大象出版社



歷代詞話續編

上

張璋 職承让 張驊 張博宁 編纂



大象出版社

序 言

● 张 璋

各民族都有自己的诗歌,中华民族的诗歌可谓源远流长,有文字可考者,当滥觞于《诗经》,绍之以楚辞、汉魏乐府,然后唐诗、宋词、元曲。它们一脉相承,各具特色,浩如烟海,蔚为大观。

词是诗歌的一种形式,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与体裁,同诗并行发展,成为我国文艺百花园中的一枝奇葩。

词,原来有曲子词、乐府、诗余、长短句之称,随后才逐渐明确统称为“词”。从这些不同的称谓中,即可看出它产生的渊源和起因。词的源头有三:燕乐、民歌和近体诗。词的属性有二:一是它的文学性,一是它的音乐性。而这两种属性的结合,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便产生了“词”这种特殊的文学形式。它既对上古的诗经、楚辞、汉魏乐府等有所借鉴,又对唐代近体诗的格律有变通地吸收。因此,它继承了中国诗歌的优秀传统和各种体式(特别是杂言体),并在某些特定方面加以发扬,这就是它所以称为诗余、乐府、长短句的原由。但是它的雏形还是来自民歌,后来为文人所接受,逐步加以仿效、提高、雅化、定型化,遂形成它特有的“词有定格,字有定数,韵有定声”的体式。这是它产生的文学渊源。另一原因则是来

自当时音乐方面的需要。隋朝统一中国,结束了三百多年的纷争局面;特别是唐代的兴起,经济、文化及对外关系都有了极大的发展,遂在汉族中原音乐的基础上,融合边疆少数民族和外来音乐形成了一代新声——燕乐。宋人王灼《碧鸡漫志》云:“盖隋以来,今之所谓曲子者兴,至唐稍盛。”这里所说的“曲子”,即指隋唐时代的燕乐。为配合这种新生的歌辞,便产生了“曲子词”。这就是词产生的另一原因。从曲子词、乐府、琴趣、笛谱、樵歌、渔歌等词的最初别名来看,即可知词与乐相伴而生,交互发展的匹配关系。但到后世,与词相伴的曲谱逐渐失传,词遂从依附于乐而走上脱离音乐的纯文学道路。由“倚声填词”进入“按谱填词”,即是这一转变的重要标志。

词究竟诞生于何年何月,现已无法确指。但可以这样说,远在距今一千三百多年前的隋朝,它已处于萌芽状态。隋朝建国之初,由于结束了连年纷争的局面,人民生活渐趋安定,文化生活有所提高,民间和宫廷不断创作一些新的歌辞以适应新型音乐——燕乐的需要,在酒席筵前或其它喜庆场合,吹吹打打,弹弹唱唱,使气氛更加热烈和欢快,当时所谓的“曲子词”就这样诞生了。要问由谁初创,已无从查考。不过,从现存的文字记载中,还可以看到隋代流传下来的曲调,如《水调》、《河传》、《泛龙舟》、《安公子》、《穆护砂》等,可惜大部分歌词已失传了。

隋朝寿命很短,即为唐朝所取代。入唐后,在诗歌盛行之际,词也逐渐成长起来。二十世纪初在甘肃敦煌石窟中发现的唐代手抄本中,保存了大量民间词。据考证,有的还是初唐时期的作品。从这些词可以看出,民间词的体制,已开始有了初型,不仅有小令,而且出现慢词,并有了专集《云谣集》,这是我国所发现的第一部词集。这批词的原件,于清朝末年被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

等盗走，分别藏于伦敦博物馆和巴黎国家图书馆等处。现在国内能看到的《云谣集》及其它杂曲子，是我国学者从国外抄回出版的。

燕乐的风行和曲子词的广泛传播，引起了诗人们的注意，特别是像李白、刘禹锡、白居易等大诗人，他们不但欣赏喜爱，而且也学着“倚声填词”，加以仿作，于是有了文人词，使长期流传于民间的词，逐步走进了典雅华美的文学殿堂。有人把李白的《菩萨蛮》、《忆秦娥》作为文人词的“始祖”，但也有人承认这两首词是李白写的。不过刘禹锡、白居易的“著作权”则从来没有争议。刘禹锡和白居易是同龄人，都出生于公元七七二年，比李白晚七十一年，就从刘、白算起，文人词也有一千二百年的历史，更何况在刘、白之前，已有韩翃、顾况、张志和、戴叔伦、韦应物、王建等一批文人的少量词篇流传于世，而且张志和的《渔父》还随即传入日本。

盛中唐时期，诗人填词不过是玩新鲜，偶尔为之，数量不多，影响究竟有限。到了晚唐、五代，像温庭筠、韦庄、冯延巳等一批词人接踵而起，他们既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又有文学才华，在他们亲身实践和大力倡导下，词这种新的创作形式，在文人手中得到了巩固和发展。特别是到了五代纷争割据时期，词在我国南方一时偏安的地区形成了两个重要阵地。一个在西蜀，由韦庄、欧阳炯、孙光宪等形成了一个群体。他们奉温庭筠为祖师爷，词风浓艳绮靡，婉丽多姿，作品丰富，词调纷繁。由后蜀赵崇祚把温庭筠以下晚唐五代十八位作家的五百首词编在一起，题名《花间集》，影响所及，甚为深远。词作为独立的文体与诗并传，《花间集》是一个重要标志，这便是后来称之为“花间词派”的由来。另一个重要阵地在南唐，主要成员有李璟、李煜、冯延巳等。他们的词风大都情致缠

绵，醇美秀婉，后人称之为“南唐词派”。他们中取得最突出成就的是南唐后主李煜，他降宋之后，作为亡国之君，难以忍受囚徒生活的屈辱和痛苦，以他那稀世奇才，写下了不少思念故国、缅怀往昔的名篇，感情真挚，形象生动，富有强烈的感染力，可以说是这一时期词坛中巍然屹立的顶峰。以温、韦为代表的“花间词派”和以李煜为代表的“南唐词派”，继往开来，在词的发展历程中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从而使词这一文体，由长期探索达到成熟，完成了它的开创期。

赵宋王朝结束了五代纷争的局面，统一了中国，经济、文化都有很大发展。作为新兴文体的词，也大放异彩，与“唐诗”、“元曲”并列为时代文学的三座高峰而进入全盛时期。确实，在宋代文坛上，词最富有活力，成就也最为显著。名家辈出，著作如林，各种风格流派，标新立异，争奇斗艳，使词坛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名家中能够自成一体就有：柳永体、东坡（苏轼）体、淮海（秦观）体、清真（周邦彦）体、易安（李清照）体、稼轩（辛弃疾）体、白石（姜夔）体等。后世词人各有所尊，形成了不同的风格流派。

北宋初期的晏殊、欧阳修等，仍继承“花间”遗风，他们的闲情逸致之作，反映了宋王朝初建时期的太平盛世。柳永以落魄文人，“奉旨”填词。他长期生活在下层社会，熟悉平民的心态与爱好，他雅俗共举，尤善于运用通俗语言甚至民间俚语入词，深受群众喜爱，据说当时凡有井水处就有人唱他的词，恢复了词的平民性，对词在民间的广泛普及，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他又精于音乐，创制了许多新调，在小令向慢词拓展方面做出了可贵的贡献。在他的努力下，词彻底摆脱了“诗的附庸”地位，为宋词的进一步繁荣开创了新局面。一代文豪苏轼，天才横溢，纵

横开合,在词的体制、意境、风格诸多方面都有所创新,他大胆突破晚唐以来“词为艳科”的传统框框,用大手笔写山川景物,写社会人生,以诗为词,阐发哲理,豪迈壮观,神逸洒脱,大大地拓宽了词的题材,充分地发挥了词的潜在效能,从而提高了词在文学领域中的地位。他的功绩不仅创立了对后世有深远影响的“豪放词派”,而更重要的是他为整个词体的发展指引了新的方向。秦观词,以清丽淡雅著称于世,读之有味,嚼而无渣,不失为婉约派的佼佼者。具有卓越音乐才能的周邦彦,曾担任朝廷音乐机关大晟府的主管。他利用职务之便,搜集整理古典音乐,进行总结,创制了慢、引、近、犯等许多新调,为词乐的提高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是第一个以四声(平、上、去、入)分辨词调的人。他的词,格律谨严,音韵和谐,雍容典雅,清丽融圆,为千姿百态的词苑提供了规范化的准绳。两宋之交的女作家李清照,以其清新的风格,口语化的辞藻,真挚的情感,浓厚的生活气息,写出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名篇绝唱。并以压倒须眉之势,总结词史,评点历代名家,提出词“别是一家”的理论。她的《词论》,篇幅虽短,却是我国词学史上第一篇全面系统论述词学的词话专著。因此,李清照既是声律大师,又是语言大师;既是词的创作家,又是词学评论家。她以巾帼奇才,独树一帜,取得女界桂冠的重大成就。

词至南宋,发展到了一个新高峰。由于金兵攻克汴京,中原沦陷,社会动荡不安,在抗金怒潮的推动下,以辛弃疾为代表的陆游、岳飞、张元干、张孝祥、陈亮等一批爱国词人,重振豪放词风。他们大声镗镗,气吞长虹,从激烈雄健的笔锋中,放射出爱国主义的光辉,使词在境界和风骨上取得了重大突破,成为南宋词的主流。特别是文武兼备、终生不得实现抗金宏志的辛弃疾,胸怀激愤,壮

志难酬，沉郁忧闷，不得其解，时而用如椽大笔放声挥斥，时而以委婉缠绵之声，旁敲侧击，蕴藉含情。他的词风，豪放为主兼及婉约，豪放而不粗犷，婉约而无纤弱之态，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他一生写词六百余首，数量之多，题材之广，气骨之盛，境界之高，辞藻之美，笔法之妙，堪称宋人之冠。南宋后期，婉约派也有所发展，形成两派并进的局面。婉约派词人，大都精通声律，在音乐语言和艺术造诣上都有突出贡献。他们的代表人物有姜夔、吴文英、张炎等，姜以清刚擅胜，吴以柔丽见长，张以清空雅正相标榜，艺术上各有特色，都取得了重大成就。但是，由于过分强调格律和辞藻的形式美，思想性有所削弱，使词的艺术性与其社会功能渐趋疏远，给词的发展带来不利影响。特别是随着宋王朝的衰亡，词乐逐渐失传，使词后来走了一段中衰之路。

金人词，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说是宋词的一个支脉。一则是时间上的部分并行，再则是绝大部分作家为宋人入金者。所存作品虽然不算太多，但诸家名篇尚且可观。吴激、蔡松年始于前，元好问殿于后，此外尚有少数民族作家完颜亮、完颜璘等，词亦奇特壮观。纵观金词，多取法于东坡，笔力刚劲，气势恢弘，自成格调，呈北国之雄风。

由元到明，一般认为是词的中衰期，但确切地说，则应称为转折期。元代以强悍的蒙古族入主中原，经济、文化受到严重摧残。人分四等，汉人居末；科举废止，士人受贬；传统文化衰退，市民文化代之而兴；由词蜕化演变而成的元曲，成为市民文化的主流而登上时代文学的宝座。词至元而降到次要地位，因袭多，创见少，既无宋词拓展的活力，更乏笼括一代开宗立派的大家，强弩之末，只得以宋词余波而渐趋中衰。但由于它已经经历了宋代

全盛期而具有完美的艺术形式，所以中衰不致中断，而且时有佳篇问世。元初，宋金遗民尚有余响，仇远、李冶属之；另有汉人降将刘秉忠、张弘范，词还壮丽。后有诗人词客王恽、刘因、张埜、张翥，书画家赵孟頫、鲜于枢，作曲家白朴、马致远、张可久，以及少数民族作家耶律楚材（契丹人）、司马昂夫（维吾尔人）、李齐贤（朝鲜人）、萨都刺（蒙古人）等，各具特色。特别是萨都刺的《天锡词》，清旷雄奇，为世人所重，其代表作《满江红·六代繁华》、《念奴娇·石头城上》，都是金陵怀古的名篇，气势雄伟，风格豪迈，可与苏轼的《念奴娇·大江东去》和王安石的《桂枝香·登临送目》相媲美。

朱明王朝取代蒙元而有天下，高度集权，法网森严，八股取士，思想禁锢，除反映市民生活情趣为特征的小说成就较高外，其它文学作品较之唐宋皆有逊色。就词而论，既处于中衰的末期，又处于复兴的初期，它是词史上的转折期。它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曲折中前进，在低潮中探索，终于走出了衰落期的谷底，打开了复兴重振的大门。

明代初期，宋元遗风尚能为继，如刘基、高启、瞿佑以及跨代词人倪瓒、邵亨贞、凌云翰等，或以沉雄疏犷取胜，或以清丽缠绵见长，其承前之功，不可抹灭。刘基可谓明初词坛的代表，他的小令清新圆润，自然流畅；长调浑厚雅正，笔力道健，谈古论今，气象非凡。高启以委婉之笔，道出了他从政前后的矛盾心态，他对明初统治者虽有高度警惕，但终未能逃脱腰斩于市的厄运。他的咏物词颇具特色，随物赋形，托物寄意，艺术感染力甚强。总之，明初作家，有不少反映时代和社会的佳作。

明代中期，有聂大年、吴宽、马洪、施绍莘等许多作家，也有大量作品传世，但一般说来，水准平平，未能取得

可观的成就。后来虽有博学之士杨慎、王世贞，书画才子唐寅、文征明，小说家吴承恩，戏曲家汤显祖等人的染指，时有佳篇，但非本行，除某些小令、中调尚有特色外，实难为继。在此期间，最为逊色的是出现了大批幃词，歌功颂德，阿谀奉承，千篇一律，味如嚼蜡，至此可以说，词的衰退，降至谷底。但是，物极必反，静则思动。陈铎（字大声）的《草堂余意》，则以特殊的体裁和模拟方式，重振唐宋词风。他把《草堂诗余》中的春意、夏意、秋意、冬意四部分词，每首按照原韵仿作一首，这些词，仍署原作者之名，从唐之李白、温庭筠，五代之李璟、李煜、冯延巳，到宋之晏氏父子、欧阳修、柳永、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秦观、周邦彦、李清照、陆游、辛弃疾、陈亮等近五十家，只有无可署名者，才直署陈大声之名。这些仿作虽有盗名之嫌，却成为明词复苏的先兆。

时至晚明，政治腐败，社会动乱。清兵入关，国家危亡。许多爱国志士，目击时艰，慷慨悲歌。词坛涌现出一批作家，写出了大量名篇佳作，为词的复兴鸣锣开道，揭开序幕。明末词坛，以陈子龙为首，他“文宗两汉，诗轶三唐，苍劲之色，与节义相符”（见《古今词话》）。词继婉约，以“浓艳之笔，传凄惋之神”（见《白雨斋词话》）。外柔内刚，缠绵凄侧，皆为悲怀故国的血泪之作，在思想和艺术上造诣甚高，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以此，一挽明词颓靡之风，开清词中兴之运，《湘真》一集，实为发端。继陈子龙而起的有张煌言、吴易、夏完淳、归庄、金堡、彭孙贻、王夫之、沈谦、屈大均等一大批作家，时代造就了词人，在爱国词的带动下，掀起了复兴的大潮，结束了词的中衰期而完成了词史所赋予的转折任务。

明末词之所以能够起衰重振，固然有其政治、军事、经济、社会诸方面的原因，但也与明代词学研究所取得的

重大成就分不开。明代词学家,对历代词作了大量的搜集整理和深入研究工作。不仅编纂了《唐宋名贤百家词》、《花草粹编》、《花草新编》、《唐词纪》、《词林万选》、《古今词统》、《古今诗余醉》、《词苑英华》、《宋六十家词》、《草堂诗余》四集等各种总集、选集,流传至今者不下数十种,为我们保留了大量词学文献。更重要的是有一批研究成果问世,如陈霆、俞彦的《词话》、杨慎的《词品》、王世贞的《词评》、张綖的《诗余图谱》及其“词分婉约、豪放”之说、沈谦的《填词杂说》等等。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张綖《诗余图谱》的问世,使词的创作始著于谱。在元明词乐失传,词声日下的情况下,他运用四声平仄,从唐宋词的实例中探索词的创作规律,制定《词谱》,以开“按谱填词”的先声,无疑为词的继续发展,开拓了一条新路。他这一尝试的成功,解决了明清以后填词的声律依据问题,对后世繁荣词作,挽救词的衰亡,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从声律角度说,它在词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诗余图谱》所列词调有限,而且时有舛误,它本身的学术价值并不高,但是在它的启发和带动下,掀起了词学基础研究的热潮,经过几代人的辛勤努力,一批词谱、词韵、词调的专著如谢天瑞的《诗余图谱补遗》、卫元泾的《增正诗余图谱》、程明善的《啸余谱》、仲恒的《词韵》、沈谦的《词韵略》、吴琦的《词韵简》、李渔的《笠翁词韵》、胡文焕的《文会堂词韵》以及毛先舒的《填词名解》等等相继问世,屡经揣摩,不断提高,直至清初,才完成《词律》(万树编)、《钦定词谱》(王奕清等编)、《词林正韵》(戈载编)等比较完备的词学基本工具书。因此,在词学的基础建设上,明人探索之功不可埋没。由此可见,词乐的失传,是词“中衰”的重要原因,而词谱、词韵的诞生,则是词这一具有特殊形式的韵文体裁得以“中兴”和赓续发展的重

要条件。这就是从“倚声填词”进入“按谱填词”的重大历史转变；这就是明词从“中衰”转向“中兴”完成其转折期的艰苦历程。

明清之交，随着朝代的更迭，词坛出现了大分化：以陈子龙、夏完淳为代表的一批词人，在抗清的激烈斗争中以身殉国，作为民族英雄，流芳百世；以屈大均、金堡、王夫之为代表的一批词人，在抗清失败后，作为明代遗民，誓不仕清，或削发引渡浪迹江湖，或隐居山林埋头著述，以保持民族气节；还有一批词人如李雯、宋琬、龚鼎孳等，在清廷高压和收买双重政策的策动下，出仕新朝，取得一官半职；也有像清初词家领袖吴伟业，被迫屈节，深感内疚，早年以香艳词著称，仕清后词风为之一变，激厉沉郁，凄苦悲凉，悔恨之心，感愤之情，时流辞章，最后写出《贺新郎·病中有感》忏悔词，以终其生。

就整个清代词坛论，继明末开创的新局面之后，无论是词学研究，还是词的创作，都出现了繁荣景象，名家辈出，硕果累累，著作如林，不可胜数，争芳斗艳，异彩纷呈。他们在继承中发展，不断创新，形成不同风格，创立不同流派，各自标榜，各有群体，师承相袭，代不乏人，在相互论辩中，又各有嬗变。

清代有三大词派：一为阳羨，一为浙西，一为常州。

清顺治年间，以陈维崧为领袖集结江苏宜兴一带词人，形成阳羨词派。这一词派，在清初动荡的历史背景下，既有政治倾向，又带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其成员多明末遗民和忠烈后代，眼界开阔，重视现实，崇尚意志，气势磅礴，袭苏（轼）、辛（弃疾）豪放之风，歌凄清苍凉之调，在清初词坛颇具影响。

到了康熙中期，社会安定，在清王朝走向全盛期的历史背景下，以朱彝尊为宗主的浙西词派兴起。他们与阳

姜词派相对立,以“情趣”代替“意志”,以“空灵”代替“质实”,以“雅醇”代替“豪迈”,贬苏(轼)、辛(弃疾)而宗姜(夔)、张(炎),词风为之大变,和者甚众,有龚翔麟、李良年等辅之于前,汪森、厉鹗等继之于后,词风清丽,格调谨严,遍及全国,对清词影响甚大。

在阳羨词派宗苏辛而末流趋于粗犷疏宕和浙西词派宗姜张而末流趋于空浮纤巧之际,由张惠言始倡而周济完成其体系的常州词派,于嘉庆、道光年间应运而生。他们既不满浙西派的萎靡堆砌,又不满阳羨派的粗犷叫嚣,遂拈出“意内言外”之说,以“比兴寄托”相标榜,崇温(庭筠)、尊周(邦彦),力求浑化雅正,影响所及,直至清末。该词派在摆脱空泛、疏犷两方面都起到了积极作用,但由于过分强调寄托,有时流于晦涩,这是不可取的。

在三大词派之外,尚有“男中成容若,女中太清春”(纳兰性德和顾春)。他们是满族两大词人,也是清代婉约词中的佼佼者。纳兰推崇南唐后主(李煜),太清偏爱漱玉易安(李清照),他们继承了二李清新情致词风的衣钵,在清词中另辟蹊径,各自取得卓越成就。

时至晚清,朝政腐败,民不聊生,社会动乱,国势日衰,特别是鸦片战争后,外患迭起,丧权辱国,激起了爱国主义思潮,如邓廷桢、林则徐、张景祁等,写出了以反对外来侵略为主题的词篇,情调深沉,斗志激昂,继承了爱国词的传统。

由晚清到民国的近现代,是我国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灾难期,同时也是我国的大变革时期。在此期间,涌现出大批词人和词学家,如王鹏运、文廷式、郑文焯、朱孝臧、况周颐、王国维等在词学上造诣颇深,不仅有许多名篇佳作,而且在词学的研究上做出了重大贡献。时代在前进,反映现实斗争的词风在发展。改良派的梁

启超、谭嗣同，革命派的秋瑾，都有佳作流传于世，后二人还为挽救国家危亡而捐躯。“五四”之后，即令是提倡白话诗文最力的胡适，亦有词篇留世。可见具有独特文学形式的词，它的生命力是如何的顽强，直至当代，仍光芒四射，代不乏人，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前进。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前仆后继，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取得了反帝反封建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人民民主的新中国，于今正朝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勇前进。在革命和建设时期，与国家民族命运紧密相连的诗词同仁们，或引吭高歌，或低吟浅唱，掀起了以爱国主义为主旋律的现实主义的创作热潮。在此期间，词的著名作家与词学家，有毛泽东、柳亚子、郭沫若、陈毅、叶剑英、夏承焘、唐圭璋、龙榆生、叶恭绰、沈祖棻等。特别是毛泽东，以其卓越的才识，饱满的革命激情，在伟大实践的基础上，驰骋想像，行云流水，出神入化，述志言情，写下了许多震惊中外的诗词名篇。这些作品，无论是“在马背上哼成的”，还是“闲庭信步”时得来的，都能熔思想性和艺术性于一炉，篇篇锦绣，字字珠玑，写出了当今历史面貌，反映了伟大时代精神，成为革命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典范，登上了中国当代诗词的顶峰，从此揭开了我国诗词发展史的新篇章。

以上我们扼要地叙述了中国词史的概貌，从中可以看出其发展的轨迹。既有绚烂的昨天，也预示着光辉的未来。即以此作为本编的序言。

二〇〇〇年于白云书屋

凡 例

- 一、本编汇编历代词话 118 篇。上起民国初年，下迄新中国建国前夕。
- 二、本编按历史顺序排列，采取汇编体例，不作分类编组。
- 三、本编所辑词话，以讲词学理论、体制、风格、流派、品评、作法为主，对格律、音韵、考辨、版本诸方面之论述，亦适当兼顾。
- 四、本编所辑，以内容为主，有些著作在体裁上虽不以词话形式出现，如序跋、题咏、札记、书函等，凡具有词话性质之诗文，亦酌情选录。但对文学史中之论词章节和词谱、词韵及词书目录等之专著，概不收录。
- 五、本编对某些篇幅过大之著作，或选其部分章节，或辑其部分要点，而不全文收录。
- 六、本编对重新整理编纂之词话，因与各种词话原作重复较多，为节省篇幅计，则未收录。
- 七、本编对同一作者内容有较大重复之词话，如况周颐之《蕙风词话》与其《餐樱庑词话》、《香海棠词话》（亦即《玉梅词话》）等，则舍其后期重新整理之通行本，而收其不常见之早期著作，以便对照研究，了解其词学思想发展之渊源及脉络。
- 八、本编收录一批“谈词话”之作，对词话发展史之研究提供了许多宝贵见解及资料。

九、本编还收录一批“论词绝句”，其中不少精辟之言，对加深历代名家、名作意象之体察，颇得其妙。

一〇、本编是汇编本，同一篇诗文因出自不同时期的不同版本，文字上会有不同。对此，亦都悉依原样，不予统一，如苏轼的《念奴娇·大江东去》中就有“乱石崩云”、“乱石穿空”，“强虏”、“檣櫓”，“人间如梦”、“人生如梦”等不同文字。

一一、作者的名、字、号等，在不同的文章中用字也不统一，如况周颐，常书以夔生，有时用夔笙、葵生，亦悉尊重原作不予更动。

论词宗派	王闿运(1)
湘绮楼评词	王闿运(3)
蒿庵词话	冯 煦(8)
菌阁琐谈	沈曾植(17)
大鹤山人词话	郑文焯撰 龙沐勋辑(22)
大鹤山人论词遗札	郑文焯撰 龙沐勋辑(30)
郑大鹤先生论词手简	郑文焯撰 叶恭绰辑(38)
强村老人词评	朱祖谋撰 龙沐勋辑(42)
词学讲义	况周颐(43)
餐樱庑词话	况周颐(48)
香海棠馆词话(又称《玉梅词话》)	况周颐(111)
玉栖述雅	况周颐(118)
楼窗杂记	汪兆鏞(131)
袁碧斋词话	陈 锐(133)
词比	陈 锐(141)
雪桥词话	杨钟羲著 张 璋辑(162)
《词史》自序	刘毓盘(182)
近词丛话	徐 珂(184)
海绡说词	陈 洵(194)
饮冰室评词	梁启超(198)
小三吾亭词话	冒广生(201)
疚斋词论	冒广生(263)
韦斋杂说	易 孺(348)